

## 抗战记忆 桂林抗战文化城名人录⑩



①

邵荃麟：  
永不停歇的  
「文化斗士」□本报记者  
张苑

②



③

图①：邵荃麟在桂林  
留影。  
记者张苑 翻拍图②：1942年，桂  
林文化供应社全体职工  
合影，邵荃麟也在其中。(资料图片)  
图③：邵荃麟和夫人  
葛琴。  
(资料图片)

## 执着而坚定的“隐蔽党员”

1906年，邵荃麟出生于重庆。他童年时被家里送回老家宁波府慈溪县接受启蒙教育，读完小学后于1919年到上海读中学。6年后，邵荃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。

邵父希望儿子成为一名经济学家，或者成为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金融家或药材商。然而，年轻时，邵荃麟却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，尤其偏爱鲁迅、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，对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也爱不释手。1925年，面对国家民族危亡，他悄悄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亦民”，并高喊“打倒列强”的口号，投身于五卅运动的热潮中。

1926年，邵荃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，他无法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，作为学生党员的他一面读书，一面发动进步学生参与革命行动。因参与革命行动，复旦大学的两位校友被捕了，邵荃麟也受到影响。为了“避风头”，邵父安排儿子去日本留学。而邵荃麟却铁了心要投身革命。于是，他背着父亲悄悄留在国内，继续他热爱的革命事业。

之后近二十年时间里，邵荃麟在国统区以文化人、作家、理论家的身份活跃于中国文化的舞台，激发广大知识分子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情怀，领导他们以笔当枪，开展抗日救国斗争。

1934年初，党组织决定邵荃麟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长。为了发动更多的文化人参与反帝行动，邵荃麟在上海开办了西门书店。那时，不断传来共产党人被捕的消息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。作为共产党的“地下工作者”，邵荃麟瞒着家人从事党的工作，与敌人周旋、斗争，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追求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邵荃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辗转多处从事文化宣传工作。他以笔为武器，以文章为载体，为抗战文化事业鞠躬尽瘁。

## 投身桂林的“文化先锋”

皖南事变前夕，局势日益恶化，大批文化人士云集桂林。邵荃麟在党的安排下，于1941年春来到桂林。

“文艺应成为暴露黑暗、歌颂光明的武器！”1941年，在桂林出版的《文化杂志》创刊词中，这句铿锵有力的话，点燃了众多文化人心中的火焰，也为当时的桂林抗战文化城注入了鲜活的力量。

这篇创刊词的作者，正是《文化杂志》的主编、时任中共南方局文委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的邵荃麟。

邵荃麟，原名邵逸运，曾用名邵逸民、邵亦民。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、作家，曾就读于复旦大学，年轻时受到中国新文学和进步思想的影响，逐步走上革命道路。抗战时期，他积极投身党的文化事业，成为心怀家国的“文化斗士”。

1941年，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，桂林因战时的特殊地位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，成为大后方的“文化绿洲”。邵荃麟也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桂林，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委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，领导当时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。在桂林的三年间（1941—1944），他组织文艺创作、创办进步刊物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，用满腔热忱唤起民众的抗战觉醒。

置身于美丽的桂林城，邵荃麟却无暇欣赏风景。他每天忙碌于各种事务中，以笔为武器，以满腔的热情，唤起民众的觉醒，点亮了这座城的“红色光芒”。

## 殚精竭虑的“文化斗士”

作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，邵荃麟倾力于桂林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。他认为，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，是新思想的推动者，因此他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。

在桂林时，为了培养文艺青年，并给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园地，他在繁忙的工作中，同夫人葛琴一起创办了一个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刊物《青年文艺》，发表了不少文学新兵的作品，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。同时，他在文化供应社时还主编了几套以广大青年为对象的丛书，如《文学创作》丛书、《中学略读文选》和各科知识手册等。这些都是当时文化供应社最畅销的书，有的再版几次，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。

“邵荃麟编书，处处都为读者着想，特别是对青年读者，他是费了心机的。”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在文章中这样表述。例如，他编《创作小说选》，不只是选辑了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，而且对每一篇小说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，从作者的简历，到每篇作品的主题和学习的要点，都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和提示，帮助读者看懂学好，这是与一般的选辑所不同的。他不仅从作品的本身进行剖析，而且注意从思想上积极引导，根据当时文艺青年的思想倾向，有针对性地在《序言》中加以分析指导。

为了帮助青年们很好地去欣赏文学作品，他建议青年们：“首先应该去认识这篇作品的主题是什么，就是说，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诉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。这种主题有时并不是看一遍就能明白，需要再三细读始能领悟的。”他举了鲁迅先生的《阿Q正传》为例，即初读这篇作品，也许会觉得是一个滑稽的喜剧，但是多看几遍，便渐渐体会出作者深刻的悲痛和愤怒。只有到这个时候，才会欣赏到作品的内容和主题，才能看到作品的现实性。

对于如何创作和欣赏文学作品的问题，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：“一篇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创造出来，是要经过怎样严肃与艰难的过程。作者在作品里所诉说的，就是他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思想。这种思想传达给读者引起了共鸣，就能转化为一种生活斗争和创造的力量。”

邵荃麟在桂林的时间，正是皖南事变之后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经撤离的低潮期。他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委派，与张锡昌、狄超白三人一起，组成桂林党的文化工作小组，由他担任组长，主要任务是做国民党上层文化人的统战工作。他的身体一直很弱，经过一场大病之后，加上工作的劳累，肺病又复发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坏。

他平日说话不多，看起来非常严肃冷静，但对人却又十分诚恳热情。他关心朋友和同志超过了关心自己，特别是关心进步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，他一再为作家的生活呼吁，并为作家的生活和权益的保障问题大造舆论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留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内迁，辗转而来都需要安置，许多具体问题亟待解决，他当时费了许多心思，从住宿、生活到工作想了许多办法，使许多文化人在生活上得到关心和照顾，感受到了党的温暖。

1942年春，茅盾在日本占领香港后，随在香港的文化人转移到桂林。当时的桂林住房十分紧缺，邵荃麟将厨房让给茅盾夫妇。由此，茅盾在《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》一文中这样回忆道：“幸亏葛琴把她家的一间小屋给我们，才解决了问题。邵荃麟和葛琴住在楼房的朝北的一小间，虽说在楼上，但不见太阳。邵荃麟在文化供应站工作，编《文艺杂志》，还领导桂林的一些青年组织讲演会。我觉得他当时实在太忙，虽然很想和他多谈谈，却又实在不忍心再剥夺他休息的时间。因为我只写文章，白天忙，到晚上就休息，但邵荃麟同志却常常还在写作或看书。”“他身体之弱，也使我惊骇。他大概比我小十来岁，但是他骨瘦如柴，常常咳嗽。可是他抱病工作，丝毫不苟。”

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，邵荃麟体弱多病，又坐过监狱，咳嗽、低热伴着咯血折磨着虚弱的身子，但他不屑一顾，像一个永不停歇的“文化斗士”潜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，领导文化界的抗日统战工作。

1943年初，文化供应社进行改组，由钱实甫接管编辑部。他排斥进步势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邵荃麟不得不离开文化供应社。

1944年，日本侵略军快要占领湖南衡阳之时，桂林进行大疏散，邵荃麟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和安排所有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安全撤退。此时，他拖着病痛的身体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工作者，而自己却顾不上疾病的折磨，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作家王鲁彦不幸于当年8月20日在桂林病逝。王鲁彦的丧事，是邵荃麟主持和料理的。王鲁彦的追悼会于8月30日举行，邵荃麟以全国文协代表的名义致悼词，对王鲁彦的一生及其文学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直到办完王鲁彦的丧事，所有的文化人都安全撤离，他自己才带着家小，好不容易挤上一节敞篷火车，匆匆离开桂林。这一天，已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发布的第三次强迫疏散令规定的最后期限。邵荃麟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，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到了撤离的目的地重庆。

在撤离桂林的前夜，邵荃麟在美丽的漓江边感慨万千。这一山一水让他欣喜，而想到革命尚未成功，心愿尚未达成，他再一次陷入彷徨中。

如今，80多年过去，桂林山水记录下了这位执着的“文化斗士”留下的足迹。如果他能走进今天的桂林，率真的他一定会留下赞美山水的浪漫诗篇。